

論語解讀

安德義 著



中華書局

论语解读

安德义 著

中华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论语解读/安德义著. - 北京:中华书局,2007.7
ISBN 978-7-101-05282-4

I. 论… II. 安 III. ①论语-注释②论语-译文
③儒家 IV. B222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93918 号

-
- | | |
|------|---|
| 书 名 | 论语解读 |
| 著 者 | 安德义 |
| 责任编辑 | 冯宝志 |
| 出版发行 | 中华书局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)
http://www.zhbc.com.cn
E-mail:zhbc@zhbc.com.cn |
| 印 刷 |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|
| 版 次 | 2007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
2007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|
| 规 格 | 开本/880×1230 毫米 1/32
印张 21¼ 插页 2 字数 400 千字 |
| 印 数 | 1-10000 册 |
| 国际书号 | ISBN 978-7-101-05282-4 |
| 定 价 | 36.00 元 |
-

序

刚读安德义君《论语解读》的当天,正好报纸上刊出一则全球祭孔的消息。当时就想:岂非巧合?由此又想到了令人惊奇的中国“孔子现象”,孔子一生,可谓“命途多舛”。其生“不知其父”,其“少也贱”,其壮年为鲁司寇而被黜,其周游列国曾畏于匡,厄于宋,绝粮于陈蔡,被隐者讥为“知其不可而为之”的“硁硁鄙人”,惶惶如“丧家之犬”,以至晚年无可奈何,欲“乘桴浮于海”,逃避当时那个“无道”之世。孔子死后,先是遭到了墨翟的背叛;接着便是来自庄子及其门徒的晒、笑、怒、骂,以至人身攻击。至秦嬴之世,“以法为教,以吏为师”,孔子及其儒学便注定了被焚坑的命运。原因者何?盖孔子处于周之末世,欲复唐虞、东周以前之政,为时势所不可。记得在1989年10月纪念孔子诞辰2540年的国际学术会上,我在曲阜洙泗之畔有绝句数首,第一首是:

周道倾颓崛孔学,无何又唱凤衰歌。

我亦儒门新弟子,登临不觉泪滂沱。

我之所以兴悲,是羡慕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之超然物论之外,而感慨孔子之陷入尘网且不遇时。汉兴,孔子儒学借火余之《周易》,以秦季之遗故得以复萌渐兴。汉人称孔子为“为汉制法”

的“素王”。即是说,孔子虽然没有居天子之君位,然其思想学说足可以成为后世的指导思想。“素王”也就是与君主相匹的精神偶像,或谓“有其道而无其爵者”。自汉迄于清,孔子一直享有“至圣先师”的地位。公元元年,汉平帝最初追谥孔子为“褒成宣尼公”。自此而后,谥号代有所隆,至清世祖福临谥孔子为“大成至圣文宣师”而后止;康熙皇帝更用“万世师表”题孔庙大成殿额。朝鲜、越南以及日本、东南亚诸国,也都有祭祀孔子的“文庙”遗迹,说明孔子影响之久远。至于近代,孔子的命运又遭遇坎坷。先是太平天国革命时期,孔子被当作“妖人”;其书被当作“妖书”,凡所统治区域,被再次焚禁。其次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,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理论家如章太炎等人也曾批判孔子;五四新文化运动中,一批激进的学者还喊出了“打倒孔家店”的口号;新中国成立以后,至文化革命后期,也曾掀起声势浩大的批孔运动。人世沧桑,由今天的祭孔读经,回溯到两千年前汉代的独尊儒术,谥爵树庙,孔子还是孔子,而孔子儒学却几经发展。孔子以后,“儒分为八”。典型的莫过于孟子、荀卿对孔学的否定之否定。秦汉而后,由董仲舒的谶纬目的论儒学而宋明之心性儒学而当代之新儒学,其形上性日益升华,而儒学观亦趋时俱进。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历史现象。这一现象表明,孔子作为一个文化历史人物是打不倒的。其所以打不倒,是因为孔子的言论及其所创立的儒学包含着人类永恒的精神价值。

孔子儒学,大约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。其一,是孔子的社会政治理想。孔子曾说:“周监于二代,郁郁乎文哉!吾从周。”(《论语·八佾》。下引《论语》,只注篇名)在孔子看来,周代的社会政治制度是借鉴了夏、商两代政治制度之美而发展起来的,那是多么丰富美好啊!“周之德,其可谓至德也已矣。”(《泰伯》)所以,从周便成

为孔子的政治理想。他企望“齐一变,至于鲁;鲁一变,至于道”(《雍也》);宣称“如有用我者,吾其为东周乎”(《阳货》);号召诸侯、士大夫乃至仁人志士“克己复礼”,使“天下归仁”(《颜渊》)。这里的“仁”即是“道”,即是“礼乐征伐自天子出”(《季氏》)的“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”(《颜渊》)的有序的、贵族专制的和谐社会。因此,他极力维护西周以来的一套礼乐制度,凡有违犯者,就要“鸣鼓而攻之”,以维护自己的理想。孔子的一生,可以说都是为了实现这一理想而奋斗,他曾自谓“发愤忘食,乐以忘忧,不知老之将至”(《述而》)。孔子之所以不为世所用,后来屡遭批判,主要原因也就是他信古、好古、佞古的社会政治理想不合时宜。然而,孔子为实现其理想所表现出的个人品格,如坚定的意志、刻苦的毅力、乐观的态度,以及执著的精神,却是值得后世认真学习和继承的。

其二,是孔子倡导的为人处世之道。孔子曾说:“吾道一以贯之。”这里的“道”是指为人处世的原则;而“一”则是忠恕。孔子私学的教育目的便是培养出一批又一批济世之才。孔子教学生要作君子儒,毋为小人儒。所谓“君子儒”,就是一个纯粹的“道德人”。据不完全统计,《论语》论及君子应当如何修己、待人、接物、处世,有107处之多;君子应该遵行的德目约有40种之多,如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、温、良、恭、俭、让,忠、孝、悌、慈、恕,贤、宽、直、敏、惠,刚、毅、木、讷、勇,和、德、爱人、中庸、知耻、笃敬等等。这些德目被罗织在以“仁”为核心、以“礼”为形式的网络中,形成一种道德形上学体系。上述道德范畴,固然有不少是承袭先王的遗教,但孔子都以他的立场、观点进行了新的诠释。其中一部分是人类永恒的道德通则,还有一部分则是随着历史发展需要而赋予新的内涵的。二者都具有不朽的生命力。孔子虽然穷其一生也未能飞黄腾达,但他的道德价值取向和伟大人格却是得到广泛认同的。他的

学生称赞他说：

固天纵之将圣，又多能也。（《子罕》）

仰之弥高，钻之弥坚；瞻之在前，忽焉在后，夫子循循然善诱人。博我以文，约我以礼，欲罢不能，既竭吾才，如有所立卓尔。虽欲从之，末由也已。（同上）

他人之贤者，丘陵也，犹可踰也；仲尼，日月也，无得而踰焉。（《子张》）

夫子之不可及也，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。夫子之得邦家也，所谓立之斯立，道之斯行，绥之斯来，动之斯和。其生也荣，其死也哀。如之何其可及也？（同上）

这些称赞难免有溢美之嫌。孔子自己也说：“若圣与仁，则吾岂敢！”（《述而》）诚然，孔子是人。但孔子好学敏求、不耻下问，海人不倦、有教无类，教导学生对道德理想的追求，则不是一般人或教师所能做到的。这恐怕也是他打不倒的根本原因。无怪乎他晚年归鲁，被国人尊为“国老”。

其三，作为教师的孔子，在“天子失官，学在四夷”，官学失隶的情况下，创办私学，传播文明，对国家社会的贡献无疑是巨大的。他在传承文化方面的凿泉引流作用也是不能否定的。尤其是孔子从教多年积累的教学经验，如：“因材施教”、“学而时习”、“温故知新”、“循循善诱”、“不愤不启，不悱不发”、“举一反三”、“学而不思则罔，思而不学则殆”、“毋意、毋必、毋固、毋我”、“众恶之，必察焉，众好之，必察焉”、“不以言举人，不以人废言”等等，都充满了辩证思维的色彩。这些也都是我们应该予以批判继承的宝贵精神财富。

孔子一生“述而不作”，而所述的言论，虽散见于先秦典籍，如《左传》、《孝经》、《孟子》、《礼记》、《易传》、《荀子》乃至《庄子》、《韩

非子》等都有,但多不能证伪。最可信的莫如《论语》。而关于《论语》,也有诸多说法。譬如《论语》之命名、编撰者、版本等都存在不同的看法。

《论语》之名,始见于《礼记·坊记》,而梁沈约以为《坊记》为子思作,是则《论语》为子思所集。但此说尚无确证。东汉王充则以为《论语》是孔子“弟子共纪孔子之言行”而成,原有“数十百篇”,“汉兴失亡,至武帝取孔子壁中古文得二十一篇,齐、鲁、河间九篇;三十篇。至昭帝女读二十一篇”,是“孔子孙孔安国以教鲁人扶卿……始曰《论语》。今时称《论语》二十篇”。此前或称《论》、《书》、《传》、《语》、《记》,无一定名。(上引参见王充《论衡·正说》)按王充所说,距古稍近;且王充以“疾虚妄”而作《论衡》,故其说殆乎可信。由于上述原因,《论语》亦有诸多版本,或称《齐论》、《鲁论》、《古论》,后来还有安昌侯张禹稽齐、鲁、古为一体的《张侯论》等。现今流行的二十篇本是为《鲁论语》。至于“孔子弟子”是谁,其说颇多,已无详考的必要。关键是《论语》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人文精神所造成的影响。

汉兴经学,经师们除注“六经”以外,注释颇多的还有《老子》和《论语》。前者盖因汉初行黄老之学所致,而后者则无疑是复兴儒学的需要。相传孔安国曾为《古文论语》作训解,但不见传本。后包咸、周氏等为《张侯论》作章句;马融为《古论》作注;郑玄亦以《张侯论》为本,并参《齐论》与《鲁论》为之作注,盛行一时,惜乎不传,部分释义于魏何晏等人的《论语集解》中可见。魏王肃有《论语解》,王弼则有《论语释疑》。其中何晏本杂采汉魏经师八家之说,具有重要参考价值。南朝梁皇侃著《论语义疏》,援道家玄语入儒,又引佛语参之,较前王、何等人虽有繁琐之嫌,但胜义迭出。至宋学肇兴,北宋有邢昺《论语注疏》,南宋有朱熹《论语集注》,对后世

影响较大。而清学中,焦循《论语通释》以精审著称;刘宝楠《论语正义》则以详博闻世。至于康有为《论语注》,更是以今文经学的立场证伪古之谬,发大同之旨,具有明显的“六经注我”的特色。近人的注本,多不受汉学、宋学之囿,且语言文字趋于平易,又如清末程树德《论语集释》,内容博洽,蔚为大观。杨树达《论语疏证》以“经”“史”“子”为证,表现了鲜明的个性。另外,如杨伯峻《论语译注》、钱穆《论语新解》等,都可谓别开生面。应该说,《论语》的生命力是因历代的注释而延续;其影响亦因历代注释而不断扩大和加深;其价值亦因历代注释而不断更新和显现。

《论语》所记孔子与其门弟子之问答言论,既无逻辑,亦无体系,故后人有所谓“断烂朝报”者;其语录亦有明显的时代和阶级偏见的烙印,故后人因此而聚讼者亦不乏其人。然《论语》所体现的孔子儒学思想的积极一面,当是主流,这却是为古往今来大多数学者所认同的。

关于《论语》的注释,古来不下三千余家,见仁见智之处颇多。但由于该类书言简意赅,不仅其本义仍有诂之欠达的问题;而且,随着时代的发展,价值观念的变化,其引申义和价值判断亦有很多需要生发和重新评估的地方。故对《论语》进行重新解读就显得十分必要了。安德义先生的《论语解读》(下称《安解》)正是这样一本应时之作。

我读《论语解读》后的首要印象是:这是一部倾注了德义君毕生主要精力的力作。我手头的《论语》注本虽然仅有百来种,但《安解》与之相较,创新之处颇多。作者曾坦言,是书在目标上力求以理贯通,即贯之以义理、条理、情理;在方式上力求以系统论进行解读,即从层次、道德、人物、历史等系统去把握。应该说,作者的目标是基本上达到了的。我以为,突出的地方还有以下几个方面:

其一,力求以信示人。把古文献宣传给今天的读者,无论就文本的校勘、训诂,还是对词语的注释、章句的翻译,都讲究一个“信”字。所谓“信”,就是要把一个真实的传世文本进行准确的标点,对其生僻字词注音、训诂,对其章句进行白话释义,力图与原初的义理相吻合,交给读者一个可信的善本。做到这一点,首先要有严谨的学风。孔子要求人们“敬事而信”(《学而》),他的学生称赞他做到了“毋意、毋必、毋固、毋我”(《子罕》)。本书在这一点上做得比较好,可以说基本做到了无一字无根据。有些地方,宁肯生硬一些,也不为之曲说,或简单地断以己意。其次还要有专门的基础知识,没有这一点也很难做到信。通读全书,我们可以看到,作者对《论语》不仅很熟,研究亦很深入,故能于诸家之注中择其善者,批其谬误,发其未发,以与原著思想更具同一性。

其二,力求以德育人。《论语》之集结成书,本来就在于宣传孔子的仁德思想,重现孔子在世时的伟大人格。孔子不仅主张“为政以德”(《为政》);做人处世也应该“道之以德,齐之以礼”(同前)。“称德”、“好德”、“怀德”、“崇德”,是孔子做人的基本点。一部《论语》,蕴含了丰富的道德形上学思想。本书特别关注到这一点。在每一篇章的“解读”部分,作者都对原文进行了道德方面的生发。尤其难得的是,作者常常互引《论语》中不同章节的同义词语,相互解释、相互发明;有时还征引《孟子》、《荀子》以及其他经书或其他集部中的相关论述以发明、引申本书,从而赋予本书以更高的地位。但它又不同于古文经学的繁琐和漫无边际。这种大量运用原著互解的手法,在一般的注本中是很难看到的,这应是本书的又一大创新之点。

其三,力争以情感人。“情”是人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,与“性”相对。情本有三义:一曰情实。如《左传》:“小大之狱,虽不能察,必

以情”(庄公十年);“民之情伪,尽知之矣”(僖公二十八年)。《论语》“情”字两见:“上好信,则民莫敢不用情”(《子路》);“如得其情,则哀矜而勿喜”(《子张》)。这里的“情”,都是指真实情况。二曰情感。如《庄子》记惠子问庄子曰:“既谓之人,恶得无情?”(《德充符》)三曰情理。如《孟子》:“夫物之不齐,物之情也。”(《滕文公上》)是说万物各异,是事物的自然之理。“性情”范畴出现于战国中后期。如《庄子》:“道德不废,安取仁义!性情不离,安用礼乐?”(《马蹄》)《易·文言传》:“乾元者,始而亨者也;利贞者,性情也。”《庄子》之前无性情连用者。在儒学体系中,一般以为“天命之谓性”,性是生与俱来的。它通过喜、怒、哀、惧、爱、恶、欲七情表现出来。由于情所接之物有善有不善,故性之发亦有善有不善。中节者为善,不中节者为不善。按照这个逻辑,除往圣先贤以外,现实的人之情都不可能是完美的。孔子亦应作如是观。本书正是从实情出发,合乎情理地还原了一个有丰富情感的血肉之躯的孔子,打破了自汉唐以来以孔子为圣为神的神秘感(当然不包括批孔一派之论)。走下神坛的孔子和凡人一样,喜、怒、哀、惧、爱、恶、欲之情,无一缺少。比如对于官位的欲求,对于周礼的拘守,对于命运的哀怨,对于不遇时的愤懑,对于暴力的忧惧,对于个别学生的偏恶和偏爱,对于旧事物的偏执,还有对于浪漫情趣的向往等等,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孔子作为凡人的真实性。作者通过他所设定的情理观和所谓层次系统、道德系统、人物系统和历史系统进行解读,将孔子不同场合的议论相互观照,进行了辩证的解析,对孔子给予了充分的理解和同情,还原了孔子一个有缺点的道德君子、一个良师益友的高尚形象。人非圣贤,孰能无过?闻过则喜,不惮改,才是君子。既然难免过错,所以加强学习和修养才显得十分必要。既然是凡人,所以才能贴近生活,贴近历史现实,合乎情理地扎根

在传统文化中,被不同时代的文化载体——人民群众所接受。须知:一个民族的精神偶像,绝不是一个极权的掌控者、一个阶级或政治利益集团可以随意树立起来或打倒下去的。他首先必须是从广大民众中来,又高于一般民众,从而成为广大民众共同的价值取向,才能树立。至于他的价值的发现者、宣传者,则可以是某一个人或某一阶层的代表人物;而他的被公认则当然是广大人民群众。偶像的亲合力就在于他是普通凡人;偶像的不朽生命力也在于他扎根于不朽的人民群众之中。如果赋予偶像以神格,那便是对偶像赐死,像现今西方人谓“上帝死了”一样。这就是所谓的“捧杀”。本书实事求是的态度,合乎情理的解读,对于拉近孔子与现时代的亲合力,既是一个特色,也是一种贡献。

此外,本书还有一些作者自己的会心之处,细读本书者自然会体会到。当然,作为一种解读本,能在前人的沃土上开出几朵新花,已是很不容易了;不尽如人意之处自然是难免的,何况君子所见各异,物论之不齐由来久矣。天下殆无正味、正色,要做到符合不同文化层次、不同观点立场的人的口味需要也是几乎不可能的。所以,只有让读者去见仁见智。虽然,我还是觉得,在信、达、雅方面精益求精,应该是本书再版时的一个预留任务。《易》之《序卦传》说:“物不可穷”也,故受之以“未济”;其《象传》说:“未济。君子以慎辨物居方。”原来学问是没有穷尽的,君子理当继续求索。其共勉之,是为序。

罗炽于湖北大学姜云居

2005年11月

自序

一 写作目标

写作历来有两类：一类极雅，阳春白雪，写给圈内人士看，读者群极小，如考据、索引、科技论文以及专业阐述，但其影响深远，历久弥新。一类极俗（俗谓通俗，非低俗），下里巴人，供普通读者浏览阅读，如小说、散文、小品，读者众多，影响广远。极雅者写得极俗是写作的上品，极俗者写得极雅是写作的精品。我在撰述《论语解读》时，常常犯难，《论语》一书，犹如西方之《圣经》，妇孺皆知，流经两千多年，研究者数千家，历代研究不乏俊杰。本是极雅之书，因其久远，阅读者多有障碍，意欲“解读”。既曰“解读”，当是极俗之书；因《论语》太雅，又是国人必读之书，意欲趋俗。太俗则有违《论语》雅正之质，太雅又难合众人之口。从写作者的角度讲，我既不想让圈内人士嗤之以鼻——太俗；也不想让圈外人士望而却步——太雅，意欲以雅俗共读为写作目标。

该目标之高远，令人神往，欲登斯堂，入斯室，难度颇大。但终因其境界高远，颇具诱惑，心向往之，不愿轻易撒手而臣服，故勉力而行，也可称“知其不可而为之”。

目标设定，风险颇大，一是求雅者嫌其俗，不能尽雅，撒手而去。一是求俗者嫌其雅，不能

尽兴，拂袖而去。这也是写作者最大的尴尬或风险，称其为“两头够不着”。既要达到目标，又要规避风险，作者心中始终勒着两条绳索，或曰两个标准，一是信而雅，力争言而有据，质实可信，典正雅懿，文采斐然。一是浅而俗，形象生动，条理清晰，亲切可读，朗朗上口。因此，给自己具体设定三条解读要求：义理、条理、情理。

一、“义理”。前人论述正确，多有因循，力求有新，但不妄自创新。笔者大胆狂言，独出机杼者约有十之三四焉，如“食不厌精”章（10.8章），“四弟子侍坐”章（11.26章），定公问兴邦丧邦（13.15章），子贡问“士”（13.20章），“子路问成人”（14.12章），“荷蓑隐士”之论（14.39章），“阙党童子”之定位（14.44章），“史阙文”章（15.26章），“见善如不及”章（16.11章），古圣先贤治国的“尧曰”论（20.1章）等。当然，所谓新见，也是遍览前贤，浸灌滋润，反复咀嚼，而后有所获，并非独创。

二、“条理”，即写作手法。《论语》一书虽文辞朴质简古，但不乏写作手法，似乎可以说：后世所有写作方法，《论语》无不具其雏形，剖析其条理，的确对习作者或对文意理解不无助益。这条理或写作手法，包括对字、词、句、章的品评咀嚼，如对《先进篇》“颜渊死”章，笔者作如是分析：

“噫”之一字，《论语》全书仅3例，系齐齿音，此一“噫”字，声音从牙缝中挤压而出，表现出孔子悲愤之极，压抑已久的悲怆，吐出了发愤忘食奋斗终身而郁郁不得志的怨气。

又如《宪问篇》“子击磬于卫”章（14.39章），笔者从荷蓑隐士角度分析入手，论其“知音，知心，知人，知世”，其条理井然，自在不言之中。

又如孔门弟子有子的两章文字，写作手法较为鲜明，笔者作了较为详细的阐释，如《学而篇》“其为人也孝弟”章：

全章可分三层：第一层，第一句：“其为人也孝弟”；第二句：“而好犯上者，鲜矣”；第三句：“而好作乱者，未之有也”。层层推进，步步紧逼，环环相扣，顺推至极。

第二层对第一层递进式的阐释作了一个归纳，“君子务本，本立而道生”，“本”即“孝悌”，“孝悌”确立了，社会道德规范也就确定了。由“务本”到“本立”，由“本立”到“道生”，逻辑推衍，层次清晰。

第三层，全章结论，“孝弟也者，其为仁之本与！”将“孝悌”与“仁德”紧密地联系，双股夹写，两股合一，丝丝入扣，强调“孝悌”乃“为仁之本”。“仁”乃治国之本，孝悌也者，修身之本，治国之本，不可殆忽，不可轻视。

又如《学而篇》“礼之用和为贵”章：

有子的这段话，是一段对仗工整、形式完美的对偶句。前一节是两个工整的“…之…为…，”的对仗结构，分别指出“礼”与“和”相互制约的重要性；后一节则对举了两种“不行”，指出了“礼”与“和”的偏颇与不足。两者相辅相成，构成一个完整的意群。从句式的关系角度看，它可以是一个并列句式：“礼之用，和为贵，知和而和，不以礼节之，亦不可行也。先王之道，斯为美，小大由之，有所不行。”第一句谈“和”，第二句谈“斯”，它实际上是一个双起双承的句式。双承又分顺位承接式和错位承接式。顺位承接式应是：“礼之用，和为贵；先王之道，斯为美。知和而和，不以礼节之，亦不可行也；小大由之，有所不行。”“知和而和”句承接“和为贵”，“小大由之”句接“斯为美”。有子没有采用并列错位式，而是采用了错位承接式：“礼之用，和为贵；先王之道，斯为美，小大由之，有所不行。知和而和，不以礼节之，亦不可行也。”语势连贯，首尾

承接,遥相呼应。

三、“情理”。孔子是圣人,是至圣先师,但他也是一个常人,一个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。如孔子晚年感叹,“莫我知也夫”,以及“子击磬于卫”,荷蓑隐士认为孔子“莫己知也”,有哀怨之情,笔者亦认为孔子确有怨尤之叹,终身劳苦,栖栖遑遑,东奔西走,“知其不可而为之”。仁道不复,天道不公,岂能毫无怨言?有,也极为正常,不必拔得太高,不食人间烟火。有怨言,有怨气,孔子的宣泄方法与一般人也不同,他是独自感叹,“莫我知也夫”,独自击磬以宣泄。连独自感叹独自宣泄这种方式,我们都不允许孔子出现,似乎太残酷了,太不真实了,或者说太完美了,太完美则不美了。孔子是圣人,也是常人。是圣人,他伟岸高大,境界高远;是常人,他有爱,有恨,有牢骚,有痛苦,有快乐,有幽默。我们在解读孔子时,品析孔子一言一行,既要想到他是圣人,又要想到他是常人,如此理解方觉可亲可信。

另外,孔子许多幽默诙谐、机智、喜怒哀乐尽在作者笔下展现,笔者不胜赘述,开卷读者自可品评。

论据与义理的叙述若构成一个完整的叙述整体,相互补充,这些论据则让其出现在解读正文之中;若不构成叙述的整体,该证据则不另出,以免繁赘,影响普通读者。如:“学而时习之”,“时”笔者注为“时中”,“时”即“时中”之省略,在《论语》或《易经》中这类论据十分充分,笔者在解读“学而”句时,“时”不是叙述的重点,笔者则仅在注文中出现“时中”,不予详述,业内人士,一看便知,“时”之“时中”的论据颇多,一般读者不知道也没有关系。但在公叔文子“时然后言,乐然后笑,义然后取”中的“时”是叙述的重点,“时中”之言,“时中”之乐,“时中”之取,“时中”的相关证据则可在解读文中出现。

二 解读方式

阅读《论语》，总有两种感觉，初读，零章断句，细微琐碎，不相连属，全然一些道德说教，甚或前后矛盾，亦如黑格尔对孔子的评价。细读数百遍，乃至千遍后，又觉其博大精深，浑然天成，无懈可击。直如颜回所说：“钻之弥坚，仰之弥高，瞻之在前，忽焉在后。”无上无下，无始无终，无边无际，浩瀚深广，穿透历史，弥久弥新，扑朔迷离，飘忽不定。古今多少学者筚路蓝缕，爬梳剔抉，穷其一生，意欲探其奥谛，然终难能如愿。笔者亦不揣浅陋，前赴后继，重新审视前贤，另辟蹊径，探究竟于万一。

因其博大精深而飘忽不定，笔者对《论语》的解读，意欲从系统学角度去把握这个系统。

孔子论世，当有一个完整的系统，这个系统在他思想的大海中，却是条分缕析，井然有序，每一个大系统中必有一个子系统，子系统中又有子系统，对每个弟子或每个人物的言谈分析、告诫，均是从他的系统中产生。你别看他只言片语，或前后矛盾，一定是系统中的一句。孔子的系统是完整的，有序的，但又是变化的，多维的，有时甚至是一种无序之序，确如颜回所说的“瞻前忽后”，转瞬即逝，也就是说孔子的系统是一个运动的系统。据笔者研究，《论语》系统大略有四：一、层次系统；二、道德系统；三、人物系统；四、历史系统。

一、层次系统

人格修养的三个层次：圣人、君子、小人；心理修养的三个层次：仁、智、勇。人格修养也可认定五个层次：圣人、贤人、君子、士、小人。人格修养和心理修养两相叠合而有九类人格：仁圣、仁君